梦天遐思

“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在工作中死去”

——纪念阿西莫夫百年诞辰

卞毓麟

1985年2月24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五，一个国际邮包在春节的喜庆中飞来，那是艾萨克·阿西莫夫亲笔签赠的新著《作品第300号》（1984年）——他的第300本书。

此前十余年，阿西莫夫曾说：“作家自己写的作品最能说明其人。倘若有人坚持要我谈谈我自己的情况，那么他们可以读一下我的几本书：《作品第100号》《早年的阿西莫夫》以及《黄金时代以前》，在那些书里，我告诉他们的东西比他们想知道的还要多得多。”将此解读为“人如其文”，似乎胜于“文如其人”。

《作品第100号》（1969年），是阿西莫夫的第100本书，由此前99部作品的代表性片段酌加说明，精心编排而成。书末按时间先后列出这些作品的序号、书名、出版者和出版年份。这100本书中，非虚构类的占72种，包括科学读物57部，人文读物14部，以及《作品第100号》自身；虚构类的占28种，包括长篇科幻小说16部，探案1部，以及其他作品11种。

阿西莫夫知识渊博，勤奋过人，热爱写作胜过一切。他说：“我不是写作的时候才写作。在吃饭、睡觉、洗漱的时间里，我的脑子一直在工作。有时候，我会听见脑子里闪过的对话片段，或整段文章。通常，它们都与我正在写的或者将要写的东西有关。我知道自己的大脑正在无意识地进行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随时都可以动笔写东西的原因。”

阿西莫夫晚年回忆，一个家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人，除了坐在房间里写东西别的什么也不想干，是很让人烦心的。他第一次婚姻失败，部分原因也在于此。他说：“有一次，我正在写第100本书，我的第一任妻子格特鲁德抱怨说：‘你这样究竟有什么好处？等到你快要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自己在生活中错过了什么。你错过了所有原本可以用你挣的钱享受到的美好事物，那些由于你头脑疯狂，只知道写越来越多的书而被你忽略的美好的东西。到那时，100本书对你又有什么用？’我说：‘我死的时候，你俯下身来聆听我的临终遗言。你会听到我说，太糟糕了！只写了100本书！’”

这100本书中，包括首创“机器人学三定律”的《我，机器人》（1950年），著名的“基地”科幻系列小说之头三部——《基地》（1951年）、《基地与帝国》（1952年）和《第二基地》（1953年），全景式描绘现代自然科学的《聪明人科学指南》（1960年），以及迄当时为止这位作家所出版的部头最大的书《阿西莫夫氏科技传记百科全书》（1964年）等。

《聪明人科学指南》后来几经修订，书名最终改为《阿西莫夫氏最新科学指南》（1984年）。这部百万言巨著鼓励人们不必对科学望而生畏：“没有人认为，要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自己就必须能写一部伟大的作品；要欣赏贝多芬的交响曲，自己就必须能作一部同等的乐曲。同样地，要欣赏或享受科学的成果，也不一定非得具备科学创造的能力。”关键在于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要尽可能积极地沟通。

《聪明人科学指南》的成功出乎始料，出版社遂鼓动阿西莫夫继续写“大部头的书”。这就有了两大卷的《阿西莫夫氏圣经指南》：第一卷谈“旧约”（1968年），第二卷谈“新约”（1969年）。接着，又有两大卷的《阿西莫夫氏莎士比亚指南》（1970年）。

《阿西莫夫氏科技传记百科全书》后经两次增订，最终包含1510位古今科学家的传略，中文版书名《古今科技名人辞典》（1988年）。他在“序言”中写道：许多人似乎“想当然地把这本书当作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即由我带领了一队数目可观的人马进行研究和编写而成”，事实上却是“我一个人做了所有必须进行的研究和写作，没有任何外来的帮助，就连打字都是我自己干的”。“我写这本书是出于一种无与伦比的爱好。因此，我非常珍爱它”。这部巨著也很成功。阿西莫夫曾有意仿照其体例，适时再写一部《阿西莫夫氏战争与战役传记百科全书》，可惜终未如愿。

《作品第100号》过后十年，阿西莫夫迎来了他的《作品第200号》（1979年），其体例和格局与《作品第100号》完全相同，书末列出其第二个100本书的序号、书名、出版者和年份。值得一提，这十来年中阿西莫夫还出版了几部篇幅可观的文学类大书：《阿西莫夫注唐璜》（1972年）、《阿西莫夫注失乐园》（1974年）、《阿西莫夫注格列佛游记》（1980年）等。

《作品第300号》的“引言”起首就说：“让我提醒你注意某些日期……我的头100本书花了我237个月的时间；我的第二个100本书花了我113个月；我的第三个100本书花了我69个月……”

仅仅69个月就出了第三个100本书，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在此期间阿西莫夫与马丁·哈里·格林伯格合作选编了一大批短篇科幻故事集。在此前六十年间，曾有许多优秀的短篇科幻作品散见于大量科幻刊物上，再去寻觅已很不易。因此，若要找遍和读遍这些短篇科幻作品，然后作出判断与取舍，再加以背景介绍、注释评点，最后结集成册，就着实令人望而生畏。身为大学教授的格林伯格是一位科幻迷。他在同阿西莫夫的合作中，承担了大量庞杂的事务性工作，并与阿西莫夫共商编好每一本文集的要旨。阿西莫夫起先颇为犹豫：如此编成的书，该不该作为自己的作品予以编号？但他最后确信：应该如此。因为每一本这样的选编，他都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运用了他的学识专长，还大大影响了他本人的创作。阿西莫夫在其书单中用星号（*）标出这些选编，以示与其他作品有所区别。

1988年8月13日，我到阿西莫夫家做客，自然要问：“目前您已出版的书总数达到多少了？”

“请到这边来，”阿西莫夫边说边指着一排书柜说道，“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这儿，是我已出版的书。它们都是英文版的，而且实质上没有重复。非英文的译本均未在此留存。这是最新的一本，第394本。”“我希望今年能出到第400本书，但也许不一定行”。当时，离年底只剩下四个半月了。

按惯例推测，《作品第400号》应该指日可待。出乎意料的是，阿西莫夫在1989年10月30日给我来信中说：“事情恐怕业已明朗，永远也不会有《作品第400号》这么一本书了。对于我来说，第400本书实在来得太快，以致还来不及干点什么就已经过去了。”“也许，当时机到来，我将尝试完成《作品第500号》（或许将是在1992年初，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我一直期待着《作品第500号》问世，它将按时间先后列出阿西莫夫的第301本到第500本书的详目。1991年岁末，我给他寄圣诞贺卡时，还曾提及此事，但没有得到他的回复。这使我隐约觉得：“莫非有什么事情不妙了？”

1992年4月6日，阿西莫夫与世长辞。他未能为世人留下《作品第500号》，但是他留下了关注社会公众的精神、传播科学的热情、脚踏实地的处世作风、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

阿西莫夫的记忆力非常强，兼之从18岁那年开始其日记毕生从未间断，这非常有助于他叙事准确。他的日记并未出版，但他出版了三大卷自传。第一卷《记忆犹新》（1979年），写到作者34岁时为止，全书朝气蓬勃，妙趣横生，随处给人以清新的印象。第二卷《欢乐依旧》（1980年），详述作者的文墨生涯，反映他的胜利和挫折，出书那年阿西莫夫正好60岁。

阿西莫夫去世前一年，在重病中写完最后一卷自传，共23.5万个英语单词。这部自传在他去世两周年前夕才正式出版，其中文版《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于2002年面世，约六十万字。书末有阿西莫夫遗孀珍妮特·阿西莫夫写的“后记”，还有作者生前亲自编定的“阿西莫夫书目”。《人生舞台》比前两卷自传更富于思想性和哲理性，它突破时间先后的限制，把作者认为有意义的话题作为一个个专题来写。全书共有166个专题，将作者的家庭、童年、学校、成长、恋爱、婚姻、疾病、挫折、成就、至爱亲朋、竞争对手，乃至他对写作、信仰、道德、友谊、战争、生死等种种重大问题的见解娓娓道来，每一个专题不过几千字，短的仅两三千字，可读性极强。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阿西莫夫在《奇幻和科幻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告别词”：“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在工作中死去，脸埋在键盘上，鼻子夹在打字键中，但事实却不能如人所愿。”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度过了成功而欢快的一生：“我的一生差不多走完了，我并不当真指望再活得很久”“那是美好的一生，我对它很满意。因此，请勿为我担忧”。他去世不久，享誉全球的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讣文中写道：“我并不为他担忧，而是为我们其余的人担心，我们身旁再也没有艾萨克·阿西莫夫来激励年轻人奋发学习和投身科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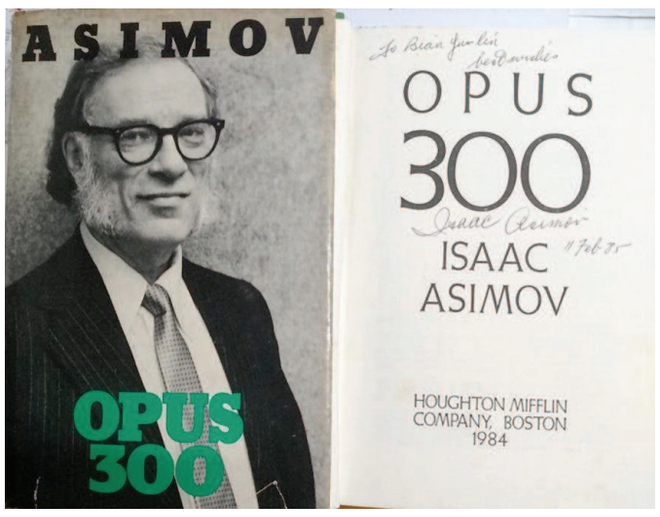
阿西莫夫一生著述多达470种，其中非虚构类作品占269种，含科学总论24种、数学7种、天文学68种、地球科学11种、化学和生物化学16种、物理学22种、生物学17种、谈科学的随笔40集、谈科幻的随笔2集、历史19种、谈《圣经》的7种、文学10种、幽默与讽刺9种、自传3卷，以及其他14种；虚构类作品占201种，含长篇科幻小说38部、长篇探案小说2部、科幻小小说与短篇故事33集、奇幻短篇故事1集、短篇探案故事9集，以及主编短篇科幻故事118集。有一位热心的图书管理员说，阿西莫夫写的书几乎涵盖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的每一个类别。确实，没人比他在更广阔的领域写下更多的书。

阿西莫夫的工作量大得惊人。但是他说：“其实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的工作量是一点一点增加的。这种情况就好像古希腊传说中的克罗托那的米洛，那位成功的举重运动员。据说他先举起一头刚出生的小牛犊，然后在小牛长大的过程中，他每天举它，直到他能够举起一头完全长大的公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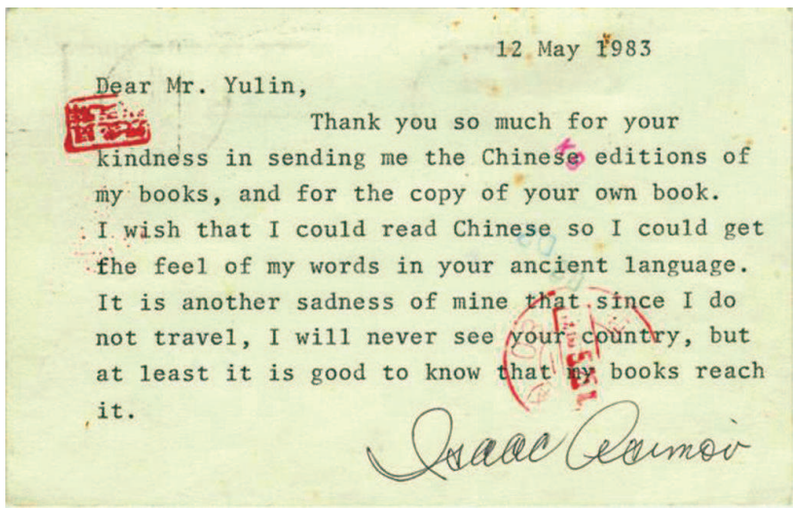
阿西莫夫在全世界拥有无数的“粉丝”，这也包括我本人。迄今在中国出版的简体中文版阿西莫夫著作，已经多达115种。须知，这并非百篇文章，而是百余本书；亦非一书多译，而是百余种不同的书！全世界无论已故还是健在的所有外国作家，其著作被译成中文的品种最多者，既不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这样的经典作家，也不是儒勒·凡尔纳、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样的类型小说作家，而是艾萨克·阿西莫夫。

四十年来，我研讨、介绍阿西莫夫的文章已不下四十篇，它们或视角不同，或主题各异，或深浅有别，或详略不一。其中，万余字的《阿西莫夫和他的科学幻想小说》（1981年）、近万言的《在阿西莫夫家做客》（1990年）、约两万字的《科普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2001年）、档案式的长文《阿西莫夫著作在中国》（2012年）等，皆颇受读者关注，庶几可为一窥阿西莫夫其文其人之初阶焉。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三日，卞毓麟在阿西莫夫家做客



阿西莫夫签赠本《作品第三百号》封面和扉页



12 May 1983

Dear Mr. Yul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kindness in sending me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my books, and for the copy of your own book. I wish that I could read Chinese so I could get the feel of my words in your ancient language. It is another sadness of mine that since I do not travel, I will never see your country, but at least it is good to know that my books reach it.

Isaac Asimov

阿西莫夫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二日给卞毓麟的第一封信

好事近

何立伟

《红楼梦》一一五回里贾宝玉见了耳闻已久、据说长得很相像的甄宝玉，之后宝钗问他，果然像你么？宝玉说，相貌虽然像，不过是个禄蠹。很有些觑不来的意思。话说回来，红尘万丈，心气甚高的宝二爷，又觑得上几个人？

所谓禄蠹者，贪求官位俸禄仕途经济之人也。读到此处我倒是想起一个熟识的人来，通常正襟危坐，作君子相，作一本正经相，内里实在一本不正经，区区亦是一宝玉说的禄蠹，而已。

此类人物，还真不好识破，更不好说破。

然我在体制内混了数十年，此类人物，见之多矣。

李创请饭，又送我一篮花生，沅陵他太太老家的，新鲜，还沾着些些泥土。回来拿琉璃碗盛了，置书案旁，观书，观影，一粒一粒剥食，注意力松懈之后才解其味，满口香。有些事，类似，当时不知，过后愈知愈深，所谓历练亦便如此。

小米的小家电甚好，我家里买了好几件，件件好用，尤其空气过滤器，工业设计有模样。空气好，则亮绿灯；不好，则红灯。我是老烟虫，书房里抽烟，一支接一支，指示灯于是一直红。且空气愈浊，风扇声愈大，到后房间里嗡嗡震响，像有几万只蜜蜂飞了进来，又飞不出去，终至于心神不宁。若停了烟，不一刻，将大静。然而，老夫停得了烟么？

弄什么都是有代价的，学习的代价，就是健康。

《惊天营救》里大毒枭对一个玩命少年说，你要记住，不管你有多狠，总会有比你更凶狠的人。

被绑架的小孩子对大人说，一个人掉到河里不会淹死，但试图要沉没在河里的，就会。

大人问，你这是在哪里听说的？

小孩子说，在一本书里看到的。

电影里，书里，都会有一些让小孩子记住的话，大人也会记住。

到岳麓山上参加雅集，好庭院，大树环抱，山下湘江河如玉带缠绕，凉风拂尽初夏晴了数日的热气。大家喝茶，聊天，案子上摆了十几把光面的团扇，有人正在团扇上写字。我技痒，亦拢去写字，结果喝茶的人皆站起来索要，于是来劲，写“人来风”，写“凉快”，写“八面来风”，写“舒服”……想起什么便写什么。一姑娘拢来说何老师，能不能跟我写两个字？问哪两个字。答曰：“慎独”。我玩笑道，你姑娘家，慎什么独呵，是拿定主意不结婚打单身吗？姑娘脸就红了，一众人也笑。我说你这么年轻，不要写这样老气横秋的话，送你三个字吧——好事近，如何？她说，那也好。

于是写了这三个字，送给她，说，要谈恋爱，要结婚，祝愿这样的好事，离你好近。

姑娘拿了团扇，说老师我要和你合个影。

我说好呵，你站在我跟前，就是好事近。

“文汇笔会”
微信二维码

祝老师演唐老师

薛忆沩

大多数人一生之中最早喜欢上的女人当然都是自己的母亲，而大多数成长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一生之中最早看到的电影很可能是《红色娘子军》，因此他们最早喜欢上的女明星也很可能是影片中女主角的扮演者祝希娟。因为这个红遍大江南北的角色，祝希娟于1962年获得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主角奖。借用今天的时髦说法，她就是新中国的首位“影后”。

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这两种“最早喜欢上”的童年经历会在自己年过半百的时候不可思议地交汇到一处。我也完全没有想到，在2020年的“母亲节”（5月10日）——这个对全世界所有人都极不寻常的“母亲节”，世界各地那么多既崇拜祝希娟又尊重我母亲的人会因为互联网而联系在一起。

这一天，根据长篇小说《空巢》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国内一家主要的网络视频平台上首映。根据网络平台的统计，截止到当天下午四点，点击量已经过亿，观看数已经达到一千六百万。我至今连手机都少用，连微信都不用，完全是这个大数据时代的“落伍者”。但是，对于这样的大数据，我还是有最起码的判断：这显然是电影获得成功的标志（相比之下，原作的读者数量实在令人汗颜，尽管它已经可以算得上是非常“成功”的作品）。而我相信这部电影的成功取决于包括天时地利人和在内的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主演祝希娟的名声和实力。

当然，也有不少观众是冲着原作来的，或者更准确点说，是冲着原作主人公的原型来的。《空巢》是我至今为止最为“成功”的长篇作品，获得过许多荣誉。小说出版之后不久，我曾经在《文汇报》发表过一篇题为《〈空巢〉中的母亲》（刊发于2014年7月26日“笔会”版）的“创作谈”，也许有的读者还会有一点印象。在那篇不长的文章里，我首次爆料说《空巢》的灵感来自我母亲三年前在深圳遭受电信诈骗的亲身经历。也就是说，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我母亲。

我母亲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她18岁上岗，55岁退休，一生任职于长沙的多所中学，最后也有“桃李满天下”的得意。她起步的地方是历史悠久的长郡中学（当时的长沙二中），在那里工作了九年。那是肖劲光、李立三和周光召等人的母校，也是现在长沙的第一名校。后来她又曾经在历史悠久的周南中学（当时的长沙四中）工作过八年。那是杨开慧、向警予和丁玲等人的母校。它花园似的校园也是我自己在六七十年代度过童年岁月的家园。在长达三十六年的从业生涯里，我母亲的角色多次变换：从天真活泼的“团队专干”、认真负责的普通老师，一直到开明低调的书记和校长。同事和学生们对她的称呼当然也随着这角色的变换而多次升级，而我母亲最习惯的始终是最普通的“唐老师”。

在这个对全世界所有人都极不寻常的“母亲节”，我母亲过得更不寻常。除了继续为生活在海外“重灾区”的儿女和孙辈们担心之外，她还坐在自己的“空巢”里，而且正好是坐在当年接到那个诈骗电话的沙发上，观看了由自己儿子的作品改编，由自己喜欢的影星扮演以自己为原型的人物的电影。她无疑是当天那一千六百万《空巢》观众里最特殊的一位。尽管我母亲从来就不承认原作里面的人物与自己的关系，而经过大规模的改编，电影的故事已经与原作的内容相去甚远，她对自己的这种“特殊性”却还是有清楚的认识。因此，她看得非常仔细，也看得非常开心。

但是，真正让我母亲开心的还不是她自己的这种特殊观看，而是与她关系特殊的其他人的观看。在“母亲节”之后的一次通话时，她兴奋地告诉我，谁谁谁给她打来了电话，谁谁谁也给她打来了电话……这些“谁谁谁”大都是她六十多年前的学生。他们都是看完了他们崇拜的“祝老师”出演他们尊敬的“唐老师”的电影之后兴奋地给她打来的电话。是啊，我忍不住感叹说，对她那些一遍一遍看着《红色娘子军》长大的学生们，“祝老师演唐老师”不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人生经历吗？！

也许是因为知道电影的故事与原作的内容相去甚远吧，我自己到现在也还没有去看过这部与自己关系特殊的电影。不过从我母亲的电话里，我知道观众的反应很积极，尤其是不少观众认为祝老师演得“很像”唐老师，还以为她们之前曾经见过面。更有意思的是，还有熟悉原作的观众认为祝老师演出了原作中被电影改编排除在外的一些关键内容，比如主人公的“过去”。

这些积极的反应改变了我对电影改编的成见。长篇小说《空巢》是一部相当悲观的作品。这从印在小说的扉页上的献词就已经一目了然：我将小说献给“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因为“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而从我母亲的电话里，我知道电影《空巢》是一部非常乐观的作品，结局更是充满了希望的光彩。在这个对全世界所有人都极不寻常的“母亲节”，对于普天之下所有的母亲和孩子，还有什么比乐观和希望更为重要的呢？！